

## ■新作聚焦

## 尹继红长篇小说《乡图》

## 对现代中国移民史的重新想象

□张抗抗

长篇历史小说《乡图》以广东江门的乡土生活为依托,描述了150年前始发、延续至民国中期的沿海农民出洋谋生大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探讨了个体与族群、亲情与乡情、仇恨与冤怒的复杂关系,彰显了侨乡人的家国之爱。

## 此岸与彼岸

此岸是檀江边渴望致富的乡民,彼岸是金山银山可望亦可即。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辛亥革命前夕的江门地区历经近百年的海外移民大潮,西风东渐,门户洞开,早年赴美的“猪仔华工”、“铁路华工”、“契约华工”,经过多年的血汗拼搏,相当一部分人已在海外略有积蓄。但在华夏子孙深入骨髓的家族意识里,彼岸是一座桥一条路一个码头,而不是家园;家园是血脉相连的宗亲,是祖辈归葬的故土。身在彼岸,心魂却没有一并带去。人在太平洋东岸挣下的金银,是必需寄回西岸去的;茫茫太平洋,载不动华人思乡爱国的心舟。在老一辈侨民的意识里,此岸与彼岸的界限,从来都是条块分明。

于是“金山客”纷纷回乡盖房造屋或兴办学校医院。民国时期,此地“洋货”流行,物资丰盛,商贸金融服务业已初具规模。也因此吸引了更多乡民漂洋过海寻梦。由几代人积累的移民经验和人脉因缘,檀江人海外奋斗的境遇,虽然艰辛艰难,却相对稳定较少风险,近代史上的侨乡新会也因此得名。这个起点,显然高于以往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有关淘金挖矿、修铁路砍甘蔗,泪痕斑斑的华工故事。

这部小说的重心在于讲述“从金山回来之后如何”,我暂且称之为“金山之重”,也即金山移动之重与人心之重。因此在整体结构上,篇幅比例显得不很匀称。前三分之一写的是兄弟二人先后由此岸去往彼岸,赚钱求生拼搏,为财负义、为情反目。后三分之二写的是弟兄二人由彼岸回归此岸,在檀江兴建铁路大展宏图。为留守家乡的同一个女人,弟兄间的情感关系一波三折。在那片散发着榕树葵林气息的热风蕉雨中,

各路好汉个个胸怀大志,各施拳脚,试图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的推进也紧凑合理。作者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老老实实说人叙事,内容扎实可信。

故事行至20世纪30年代末,船头骤然转向。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硝烟里,“此岸”不再安全。东北失守后,日军步步南下直逼广东沿海。此岸在战火中剧烈晃动,面临覆灭的危险。于是,此岸与彼岸,突然发生了易位,或称位移。彼岸是辛劳屈辱却充满希望的明天,而此岸是被蹂躏的土地及等待救赎的乡亲。

《乡图》真正希望表现和完成的,是“金山客”由彼岸折返此岸的“后移民”路径图。在同类题材中,可谓另辟蹊径,这也正是《乡图》的别具风格的创意亮点。

## 碉楼与碉堡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故事里,“碉楼”,都可作为一个极具广东侨乡特色的文化符号、一个无可替代的历史坐标而存在。2007年,广东开平碉楼成功申遗,在檀江流域,遍布偏远村落的千百座保存完好的碉楼,如今已成为江门珍贵的人文遗产。

碉楼的兴衰,以无声的建筑语言印证了历史的进步。自兴建碉楼起始,乡间开始大量使用西洋建材,如水泥钢材玻璃,均从香港进口。自新大陆返乡的金山客,实际上已经成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架桥人、现代开放型社会的敲门人、封建蒙昧团体的掘墓人。尽管他们在骨子里仍然坚守着中华文化传统,但身体里已经流动着西方工业化的物质细胞,呈现出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初样态。

至今散落于江门境内的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碉楼,是金山客以毕生血汗积攒的财富,更是海外华侨落叶归根的安身之处和荣誉象征。碉楼生、屹立于世之时,碉楼的主人从此挺起了腰板。

《乡图》一书中,碉楼始终是一种侨乡的精神隐喻。小说的前半部分写乡民内心对碉楼的

向往和膜拜,因而含辛茹苦出洋谋生赚钱,为的是终有一日回乡,能为自家建起碉楼。楼高十丈,一砖一瓦寸墙寸心。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如何守护这片碉楼林立的乡土。在疯狂入侵的日军面前,碉楼的居家功能在一夕之间转换为民间抵抗行动的坚固碉堡,成为乡间抗日力量自发保卫家乡的战场。碉楼可毁于战火,却不可毁于怯懦;碉楼可破碎可坍塌,但人的骨气血性不可践踏不可摧毁。曾经,为了摆脱贫困,在彼岸他乡,国人不得不低头忍辱;而今,在自家的土地上,还不能挺胸抬头做一回男子汉么?侨乡人以彼岸的血汗建造的此岸碉楼,必得以生命来捍卫的。

故事进入高潮,檀江边的碉楼之战,描述得十分感人动情,也将碉楼可攻可守、进退有余的奇妙功用刻画得淋漓尽致。碉楼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由“家”——保家,升华为“国”——卫国,从而实现了另一代侨民的人生价值。

所以在我的理解中,《乡图》其实是一个有关财富与心灵、逃离与回归、屈辱与自强的故事。小说的意味由此渐入深处:檀江人捍卫的不仅是碉楼,更是人的尊严。

## 他乡与故乡

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幅手绘的“乡图”。远行人告别家乡前,将此图小心藏在身上,汗湿水润,漂洋过海随身一路颠簸;到达彼岸后,始终珍存于箱底,再交给出生于异国的儿女。几十年后,纸页已泛黄变脆,仍是舍不得扔掉。只因图画着自家的房屋、村庄与河流……

江门的华侨博物馆中,收藏有侨民后人捐赠的真实乡居图,线条笨拙粗陋,质朴无华。我不识粤语,但面对这无需解说的乡图,凝目细察,别有一种贴肉贴心的亲情乡情,泪水悄然涌出。江门新会是我的祖籍,是我生命的源头之一。我父亲9岁时随我祖父去上海谋生,心中一定也有一幅自绘的乡图。我在杭州生长长大,30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杜阮老家的古井,历经半

个多世纪,井水依然清冽甘甜。因此,我读《乡图》,犹如一次迟到的补课,于我有寻根问祖的特别意味,我希望由此知晓有关故乡的前世、故人的今生。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彼岸到此岸,前后涉及几十人。司徒家族的振南、振江兄弟,侠义的偷渡船长何成彪,聪慧娴淑的女人秋月,进步青年沈琳……每个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性格鲜明饱满。书中的广东乡亲们,他们被湿润的海风与丰茂的葵林交替养育而成,是我未曾谋面却似曾相识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乡长辈。他们恰如我父亲的性情——坚定执著、敢说敢为、直率坦诚。在他们身上,潜藏着榕树气根一般顽强的生命遗传基因。

尹继红竟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这部以江门檀江县移民生活为背景的厚重的侨乡历史小说,出自于一位从内地“移民”来广东的“外乡人”之手。在此偶然的契机之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必然?

在他的创作手记中,我读到了他写作这部小说的动因和过程。那是另一部痛苦而漫长的“心灵移民史”:感动——吸收——震撼——融合——重组,心智的成长与文字的历练,在同一时间内互为因果。多年前,当他第一次站在新会“黄竹坑”的华侨坟墓前,面对裸露于黄土之外的无名骨殖坛罐的那个瞬间,即被一种强大的人类情感所感动所征服。此后的岁月,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穿行于乡村村落,流连于博物馆和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华侨历史研究专著,寻找收集考证那些散佚的往事和细节,可见作者前期准备工作严谨与充分,可知作者对该书用情之深,用心之诚。时间流逝,一个个曾经陌生的“老广”,在他的脑海中日渐鲜明丰满,以至于当他在电脑上敲下小说中的第一个人名,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异乡的一个新成员,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是他的亲人和知己……于他本人而言,这恰恰也是一次“故乡”与“他乡”的置换。

记得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有汉字的地方,就是故乡。我在北大荒度过了青年时代,我说,天下有情之处,可为故乡。一个作者者,若是心中拥有世间大爱,他乡即故乡。

尹继红这部《乡图》成稿之后,被列为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文学作品并顺利出版。他成功的写作实践,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文学的缘起,取材均可是多样的;作品的生活来源,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天下之大,芳草遍地;深井清冽,江河浩荡——优秀的作品,可汲于井塘,亦可取自三千弱水。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现代游子,何不将自己的视角放得阔远些。

## ■关注

批评界存在的种种病症已引起人们的批评,产生病症的原因人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批评的读者意识淡漠。批评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那里,成了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娱自乐、自谋私利的工具,完全没把读者放在眼里,这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说到读者意识,其核心就是为读者服务的意识。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句名言对于批评来说同样意味深长,它规定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比较萨义德等人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马克思的说法更为精辟。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具有“为人类服务”的人格操守,具体到批评写作就是要为读者服务。它还强调了“自己的学识”的重要性。批评不同于创作,也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学无术、哗众取宠、滥竽充数则将远离批评之道。

在创作之外之所以还要有批评,就在于读者对作品的鉴赏具有某种零散、感性、片面的局限性,而优秀作品特有的含蓄的审美特性又往往会使增加读者的困惑,这就为批评提供了用武之地。为读者答疑解惑就成为了批评的重要功能。批评的其他方面的功能,诸如为创作和文学史服务、为文学理论服务都离不开为读者服务这一基础,或者说只有通过这一基础,这些功能才能实现。别林斯基说过:“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为读者答疑解惑就要求批评家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把道理说清楚。批评不同于创作,创作靠形象思维,朦胧是一种美,太清楚一览无余则违背艺术要求的含蓄;而批评是科学,靠逻辑思维,强调通过分析问题讲道理,越清楚越透彻越有说服力就越好。然而,时下一些批评,似乎在存心与读者为难,各种深奥的术语、概念以晦涩难懂为时髦,长篇大论绕来绕去,读后却不知所云。西方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想的传播,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法国思想家福柯就从来不愿对自己文中提出的众多新概念作任何界定,因而文风晦涩易变,这在中国的效仿者那里,则演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概念狂欢。如果说西方学者的晦涩难懂中,还有些思想闪光值得敬意,那么中国的东施效颦者,就只是偷懒图省事的掩饰了,苍白贫乏尤如白纸一张。中国和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把道理讲清楚,是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的需要,只有把一块块石头摸清楚了,才可能有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一味沉浸在非理性的解构快感中,是一种与时代错位的幻觉。透过现象看本质,摸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探究社会、艺术、人生的真理,仍是当今批评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广大读者对批评所期待的,努力让读者容易读懂,有所收获,有所满足,是批评家对读者起码的良知和善意。

与上述存心与读者为难不同,还有一种情形是无力把道理说清楚。批评只有比创作更深刻时,才能影响创作;只有比读者更有创见时,才能影响鉴赏。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批评有时比创作比读者更肤浅,缺乏“自己的学识”,因而无力把道理说清楚。常常看到在一些文章中,回避对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把浅显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把常性的道理学术化,用大段的作品复述代替作品分析,用大而无当好听的话敷衍成篇,批评成了产品说明书和通用表扬稿以及职称评定的奏章,毫无体现批评家灵魂的灼见和新识,这实在有失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身份。

显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学识欠缺之外,还有物化社会逐利风尚的侵染。现在,批评背后已增加了各种名利附加值。在某些批评家那里读者只是一个单数而不是复数,这个单数就是被评论的对象或利益链上的对象。“复数”看不见、摸不着,“单数”则是活生生的利益攸关的具体存在。批评看着这个“单数”的眼色说话,只需要说好话、套话、不痛不痒的话,用不着费力把道理说清楚,因而也不需要什么学识,只需要交易。

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读者永远是复数,是无数众生的注视着、期待着你的人,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无名氏。他们需要的是批评家交心的真情、说真话的真诚。考察真正批评的冲动,一定有类似于爱的冲动的地方,其原初就是为了突破人类个体之间的隔膜,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寻找难得的知识。在批评家的读者意识里,还应有爱心。

爱心不是空对空的许诺。在一个注重效率和效益的年代,对读者的爱心也应落实到给予读者阅读效益的问题上。对批评来说,那就是要求在较小的篇幅里,集中较丰厚的思想和学识;在浅近通俗的文字里,表达较深刻的发现;在极抽象的推理中,尽力展示形象生动、激情洋溢的生命底蕴;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予读者较大阅读效益和实惠。

对读者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处处为读者着想,努力适应和满足读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读者的引领和提升。在呼唤伟大作家和作品,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呼唤高素质的读者群,这是前二者赖以生存的土壤。而高素质的读者群,不可能自发地自然产生,它离不开批评的引领和提升。当下,市场与读者的联手促成了汹涌澎湃的“娱乐至上”潮流,这作为对板着面孔的“工具论”的反拨,呼唤人的个体感性生存价值的复归,有其合理性。但一味随波逐流,任“搞笑”这类诗意图穷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将审美愉悦降低为生理本能快感,终将为“庸俗”所累,陷入新的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市场和读者是对的,但不能说市场与读者永远是对的。鲁迅说过:“迎合和媚悦,是不会有大有益处的。”当某些“皇帝的新衣”面临“沉默的大多数”时,批评家不能仅仅只当“看客”,应及时敲响警世之钟:启蒙的话题还未过时,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对读者群的提升。全球化时代,需要批评视野,并以此改造和提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以自身的完善推进读者群的完善,这将任重而道远。

## ■看小说

张子雨《二手生活》  
当弱势凑成群体

《二手生活》(《小说月报·原创版》2011年第4期)呈现了小人物令人激动的罕见的欢乐与幸福,写出了弱势群体高尚而美丽的灵魂,为我们刻画了一组弱者相濡以沫的群像。收二手货的谢生活在经历了一场梦似的幸运之后,也为他的善良和高尚付出了代价。他助过人,救过人,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活雷锋式的底层弱势者被控非法行医,要蹲监坐牢,而竭力将他推上法庭的,恰恰是他资助过的女学生。小说以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揭示了当下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和残酷的生活逻辑,即现实生活是多么无情和残酷,而理想是多么脆弱。然而,小说也向人们展示了弱势群体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这是小说更加令人难忘的地方,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想象。小人物不单单有痛苦,还有希望、梦想、欢乐以及高尚的情操。小说以非常投入的情感和细致的观察向人们揭示了这一点。谢生活尽管身患残疾,工作卑微,收入可怜,然而他积极乐观,向往爱情,助人为乐,待人厚道,这使他一度在小城生活得自得其乐,特别是当他将收来的二手透析机用于两个女病人治病,并与她们互帮互助、一起生活的那些梦一般的日子,是多么美好而幸福!有两句话让人过目难忘,心潮澎湃,“活着,就是幸福。前天我看一个家产几个亿的人跳楼,这样说明我们也身家十几个亿呢”,“嗯,我们都是大款呢,这太阳月亮不都是我们的嘛。”这诗意图,这境界,穷人的精神层面又何曾低下?张子雨以满腔的热爱和深沉的关切,写出了弱势者的困境和悲剧,写出了穷苦人的美好和高尚,这几乎是一切优秀文学的精髓。

## 凡一平《韦五宽的警察梦》

## 构思给力的小说

凡一平这篇小说(《作家》2011年7月号)手法很“毒”,构思很给力。既是写腐败,也涉及犯罪团伙,一石双鸟。但其用意还是揭示腐败。大家都从正面写,写官员腐败,腐败的手法与内容:小蜜、二奶、别墅、豪车,花样变来变去,仍然跳不出如佛的手心。凡一平不同,他从腐败的后院着眼、着手,设置了一个假警察装做便衣,进出于腐败分子的豪宅密室行窃。更绝的是,还设置了一个想当警察的小跟班,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小伙子韦五宽。这个创意有点急中生智。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人就有戏了。一个真心,一个假意,正面角色反面化,反面角色弄得像好人,满拧的角色设计,行动与意图的完全错位,使小说从头至尾充满了一种小品式的滑稽而紧张的喜剧效果。罪犯分子一本正经,冠冕堂皇,大吃大喝,猖狂之极。两个人大摇大摆骗保安的设计让人捧腹,也让人咋舌。罪犯与腐败官员之间的斗智斗狠,也别出心裁。小说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两个假警察在豪宅里狂吃海喝的狂欢场景,既让人忍俊不禁,又揭示了腐败的触目惊心。小说主要是展示罪犯的张狂、得意和可笑,但总让人感觉到笔意指向腐败,指向一种严肃的立意,大有项庄舞剑之趣。(师力斌)

## ■第一感受

## 社会密码与文化记忆

□孟繁华

与津子围以往的创作比较,《童年书》的变化非常大。过去津子围的小说涉世很深,他是一个个人世的作家,他喜欢浓墨重彩大开大阖,而对超拔脱俗、婉约静穆一路兴趣不大。这当然与作家风格的选择有关。但在不同的风格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一个作家内在的追求和趣味。读《童年书》我会联想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集,小说以童年小英子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北京南城的人与事,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一个稚嫩孩子的眼中折射出来。其间温婉的记忆在淡淡的感伤中弥漫四方。林海音实现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津子围的《童年书》当然也是自传体的小说。《城南旧事》是林海音7岁到13岁时的生活记忆,津子围书中讲述的生活应该也是这个年纪。这个年纪的记亿真实可靠。因此,津子围《童年书》中的故事,记载和隐含的社会密码与文化记忆是我感兴趣的。叙述主人公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八面通的小镇”上的“窄街”。它处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离中苏边境不足一百公里,过了马桥河林场,就要检查边防通行证了。中国这么大,没多少人知道那个地方。不过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北京,知道外面的世界。”它的时代是“中苏关系正紧张,‘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我家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在窗玻璃上贴‘米’字的纸条,以防玻璃被震碎了伤到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了地窖,以防空袭。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时,大家就把准备好的干粮和炒面背上,跟着前呼后拥的人群,向铁道旁的防空洞跑去。”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和苍白的时代,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记忆几乎是相同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小说中曾讲

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定量供应的粮食使每个家庭经常断粮。一次家里断粮时,母亲给了他钱和粮票,让他到饭店买馒头,陪他去的有几个伙伴,买的20个馒头让他和伙伴们吃掉了。“回家已经是傍晚了,母亲看到我两手空空,问我馒头呢,我撒谎说钱丢了。母亲的眼泪立即涌出来。事后我才知道,母亲和妹妹都没有吃中午饭,而且,那些粮票是那个月最后的指标。多年后,我一直无法回忆那件事,每当想起,我的心都在流泪。”没有那种生活经历的人,很难想象几个馒头对母亲意味着什么。作者不是“无法”回忆,而是不能回忆或不敢回忆。物质生活的贫困,在这样一个细节上被揭示得一览无余。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使无知的少年走上了第一条犯罪的道路。他们开始是捡废品,换钱买简单的零食;后来逐渐地发展到去工厂偷生产物资,甚至毁坏变电器。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极度道德化的时代。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对两性关系讳莫如深又兴致盎然。比如大人和孩子对“姜破鞋”的议论、好奇、窥视;孩子对鸭子交配的审判,这种道德的两面性只能发生在那个年代。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精神生活的贫乏状态。因此,《童年书》隐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和密码。对这些信息和密码的破译与识别是我们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是《童年书》中记载的文化记忆。

一般的意义上,作家的所有创作都是对童年记忆的反复书写,童年记忆会影响作家的一生。对津子围而言,《童年书》中最重要的记忆是“战争文化记忆”。

一方面,与叙述者讲述的话语年代有关。那个时代中苏关系紧张,战争叙事不断强化。这种战争文化一旦进入童年记忆,会激化成一种幻觉。比如叙述主人公希望原子战争真

的打起来,为的是检验自己防原子弹卧倒的姿势正确与否。同时他坚定地认为:原子弹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纸老虎罢了。战争文化塑造了男孩子虚幻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且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比如,窄街的伙伴们都被封了军队的职务,从“司令”开始,一直到侦察员、通讯兵。这种军事文化符号使童年生活有了满足感,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口头的快感,他们还要诉诸于行动。比如他们经常打群架,经常有“血染的风采”。为了逃避家长惩罚,他们还有进山“打游击”的壮举。

战争文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进程。我们经常使用的“战线”、“堡垒”、“摧毁”等话语都是来自战争文化,甚至至今没有终结。这种文化使人的思想结僵化,作为一种硬性文化,它成为一种进入、理解人的情感的障碍或屏障。这一点在《童年书》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比如“我”对女孩子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女孩子既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要表达出“男子汉”的不屑和轻蔑。“从丹的自传”一章中有一段讲述“我”看女孩子跳皮